

张岱与鲁王(下)

栾保群



正月十二日，张岱抵绍兴家。十日之后，方国安将田仰缚张岱之子张德去，随即有逼勒助饷之事。这事不难解决，张岱典卖家中余产，卖光也就是了。

二月，定南伯俞玉聘请张岱商榷军务。尽管张岱的“从龙”梦早已破灭，这次的绑架逼饷也大大出乎意料。心灰意冷，他肯定要思考这个政权还值不值得为之牺牲，即便牺牲了又有什么价值。所以他对俞玉的聘请先是推托，直到敦促至再三，不得已，才勉力到营。但到了江干前线，张岱并没有敷衍应付，此后三个多月，他不辞辛劳地乘船巡视百里江防各营汛。

四月，鲁王以礼部右侍郎之职聘请陈函辉出山。函辉立即动身，五月至绍兴。

五月十八日，张岱巡视诸营汛后得出结论：“兵不成兵，将不成将，藩不成藩，镇不成镇，江上大事已去”，遂上鲁王第六笺，中言：“北骑必早晚渡江，各藩兵将只有一散，朝中诸文武只有一逃，郡县百姓只有一迎，天下大事，如斯而已矣。”何谓“早晚”，就是清兵随时都能渡江。于是张岱辞别鲁王，再回剡中。此后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张岱的判断。

五月廿九日，张岱走后十天，清兵渡钱塘江，方国安遁走绍兴，江上诸军皆溃。时陈函辉方到绍兴十余日。

六月，清兵克绍兴。与张岱的预测稍有不同的是，朝中文武并没有全部随鲁王逃跑，其中有不少直接投降了清军。从去年的闰六月初张岱投身抗清，至此整整一年。时局变化之快，张岱可能也不会料到。在他辞别鲁王之后仅十几天，鲁王就在第一批不肯降清的文武勋臣下匆匆离开绍兴，向台州逃去。在途经剡县时，陈函辉特意乘夜到山中与张岱见了一面，那诀别的场面可想而知。张岱没有和陈木叔一起去追随鲁王，因为陈木叔此时已有必死之心，也不会赞同和自己一起走的。

曾有人说，张岱，还包括黄宗羲，没有与鲁政权共始终，是在鲁政权处境艰难时逃离到清兵占领区剃发做顺民的。我的看法是，暂不要问剃发做顺民是多么严重的罪过，先把有没有这回事弄清楚。

楚。诸位可以回顾一下，张岱第一次脱离鲁政权时，鲁政权并非处境艰难，而是处在上升期，各色人等正在蜂拥而来，其中不乏捞取荣华富贵者，张岱是被他们挤走的，虽然张岱也有咎由自取的一面。与此相反，顺治三年鲁政权处境困难的时候，张岱一听方国安让他去商榷军务，便毅然放下《石匮书》的写作，而且明知前程凶多吉少，仍慨然由剡中奔往绍兴。至于第二次辞别鲁王，鲁政权已经不是处境艰难，而是死到临头了，大厦已被蛀空，梁木已经摧折，末日已经降临，只差轰然一声巨响了。在此之前的几个月，张岱已经为鲁政权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，他既已洞悉必然崩溃，就没必要让自己的生命搭进去做无意义的牺牲。他珍重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，还有这生命对民族的价值。顺便说一下黄宗羲。黄宗羲在江上兵败之后，仍召聚义兵，想追随鲁王。在得知鲁王航海之后，他率义兵五百人四明山。复因山中无粮，他才逃入剡中。在剡中避兵三年，他与左都御史方端士入朝朝鲁王，任左副都御史，直到闻地尽死。有什么根据说他“在鲁政权处境艰难时逃离到清兵占领区剃发做顺民”呢？与张岱、黄宗羲走同样道路的，还有江南的顾炎武、归庄，永历政权中的方以智、王夫之。他们在反清失败之后剃了发，但并不等于就做了大清的顺民。如果认为宁可砍头也要留发，否则就算偷生苟活，这种观点想必不会有多少人接受。

另外，张岱并没有主动到清兵占领区去避难，他去剡中时那里还是鲁王的地盘。鲁政权崩溃之后，为了不被清兵抓捕，张岱开始了三年的流亡生涯，这期间他“无所归止，披发入山，张髻为野人”。“披发”就不是剃发。张岱并不是清兵捉拿的要犯，他所以东藏西躲，怕人告密，是因为“戎素正直苛，搜罗遍荒僻”（张岱作于顺治四年春的《避兵越王峰留谢明远上人》），所谓“戎素”，就是清人的剃发令。为了留发而像野人般四处逃窜，此间他“瓶粟履屨，不能半火”，连衣服都要借来穿，但他还是完成了《石匮书》的大部分，并写了一篇篇追怀故国都城人民的文章，编成了《梦忆》一书，也算很不容易了。顺治六年他回到山阴城时，当然是已经剃发了，我觉得时过三年，天下大局已定，也应该不必苛求了吧。张岱不是圣贤，他的毛病能找出不少，前面已经讲了一些，后面还要说。但对他的气节，我们就要平允公正，特别是有疑问时更要小心求证，不要轻易定案。像张岱这样半生苦节，四十年含辛茹苦，不用新朝正朔，只是为了在墓碑上问心无愧地刻下“有明”二字，我们怎么能忍心不加考察就说他是清朝的“顺民”呢？

跑到清兵占领区剃发做顺民的确有其人，那就是“任孔当輩”和一些朝中大佬。张岱在祭陈木叔文中有一段痛快淋漓的话，不可不引：

“鲁王所信任者，公侯、阁部、司礼、中丞、翰林、柱史皆辨发为异人。鲁王所托为腹心者，一长史以雍发降，一锦衣以投诚死，一锦衣以献官眷死。鲁王所敬礼为正人君子者，初效西山之僵饿，见快嚼而加餐；后仿义乌之披缁，

为宠姬而还俗。上不能效文山之捐生，下不能效郑思肖之苦节。皆是投诚，何论僧俗；总为雍发，不在教莩。乃犹然膺沃酒肉，储爵委媵，腆然自号于世曰‘我正人君子也’，人有不掩口而笑乎？”

这些变节者张岱都没有直斥其名，我只知道任孔当是逃回到济宁老家去了。从浙东到山东，如果不剃发是寸步难行的，而作为鲁政权中的一员，不向清军表示投诚连钱塘江也过不去。此人到顺治十七年才死于济宁，死时尚获“公祭”，肯定是清人的“良绅”了。“任孔当輩”可谓持论极左，出言激烈，但往往最后投敌也最积极，真足以让后人引以为鉴。但他还不是张岱说的“正人君子”，因为那位“正人君子”的地位远比任孔当高，是不是“东林余孽”，以后有时间也不妨一考。但“仿义乌（骆宾王）之披缁”的可能不止一人，那个马士英就是一位。马士英的结局有二说，一说是说他降清，一说是他逃亡，而逃亡后也有从军和为僧二说，但最终都是被清人杀死则无异议。弘光朝的奸臣向以马、阮并称，而阮大铖为恶胜马士英十倍。即便是阮氏降清，清人都能收容到军中效劳，如果马士英真的降清的话，料也不会被清人杀死。看弘光亡后马士英先跑到杭州扶鲁王监国，鲁王降后他又跑到浙江，虽然因误国之罪为清人所斥骂，成了过街老鼠，但终究没脱离抗清阵营。所以时人说他“一死已盖平生丑”，应该是事实根据的。但其平生之丑可盖而不可赎，如果因为他投降被杀而以“烈士”为盖棺之论，甚至认为黄宗羲、张岱等既然终于剃了发就没资格斥骂“烈士”马士英，我想，马士英在九泉之下如果良心未尽泯灭，也要说句“不敢当”吧。

方国安对钱塘江防线的崩溃负有最大责任，所以他被率先降清的阮大铖拉过去，与其负罪感有一定关系。他后来又与隆武政权暗通款曲，想伺机反正，结果被清人发现，全家被杀。明清之际降清的武将多有反骨者，其中清有它的缘故，方国安的反正应在情理之中。

另一位大将王之仁死得壮烈非常，足以让正人君子们无地自容。张岱在《石匮书》中写道：王之仁送鲁王、张国维等由江入海，然后返回宁波，把家属八十余人载于船上，全部沉海。他自己独坐松江，峨冠登岸，口称：“大明兴国公到南京请死！”至南京，蟒袍玉带见洪承畴，痛骂不止。承畴下阶跪容劝降，之仁闭目不视。死前衣冠昂立，以示不屈。

英勇就义的还有楚将军朱华燬，钱塘败后，他逃于湖州西部的长兴山中，仍然从事反清活动。后被清兵追及，自刎于北界山石磴之上，死时犹身衣缁麻。民间传说其血迹印于石上，磨洗不灭。

陈函辉被骂至海门，鲁王登舟，函辉辞鲁王曰：“老臣不能扈从远去，誓以一死报殿下矣！”遂哭入云峰山中自尽。死前作绝命词十章，有“生为大明之人，死作大明之鬼”，“子房始终为韩，木叔生死为鲁”之句。过了一年多，张岱从深山中替回山阴，从五弟道子口中才知道木叔死讯，作文哭之。在“一

心为鲁”上他与张岱声气相投，虽然未免狭隘，但也不能求全责备了。

郑遵谦出身官宦，家富于财，但嫉恶如仇，行事果敢。他与张岱在山阴学宫为同学，可能还一起谋画过反清，但性情未必契合。郑是个在前明时就敢上梁山的人物，他举义之时，老父跪求为全家性命留后路，他大义凛然，不为所动，而张岱绝对没有这个胆量，所以因为立楚立鲁意见不同，遂生嫌隙，也不足为怪。以反清意志之坚忍决绝、义无反顾而论，他比张岱大有过之。他是义军中的主要领袖，封为义兴伯，在监国政权中的地位也远比张岱为重要。钱塘败后，他随鲁王入闽，准备继续抗清。唐王朱聿键牺牲后，郑成功想用旧唐王年号，不接受鲁王。闽中大将郑彩倒是拥戴鲁王，但其自有野心，为了控制鲁王，他先除掉鲁王的大学士熊汝霖，又袭杀郑遵谦，投尸于海中。张岱在《石匮书》中论及此事，对郑遵谦之死并无痛惜之情，反说：“人臣至国破家亡而举兵起义，事有可为，则竭股肱之力；事不可为，则继之以死，此起义之定局也。盖起义之人，义既不成，以一死谢君父，以一死谢乡里为吾战死累死之人，一死而起义之事尽矣。郑遵谦逃死闽中，最终没有死于敌人之手，而为内贼所杀，就不是完美的结局，也就是不能成其为‘义’。宗老这番议论，不知将置自己于何地，他也许认为自己没有参加绍兴起义，所以无所谓‘义’之与与不了吧。

监国政权中最重要的大臣应该是张国维。惠王降清之后，同样是前明大臣，他没有像刘宗周和祁彪佳那样以死明志，而是在东阳、义乌举义反清，并亲率八千义师迎立鲁王。在唐鲁对立问题上，他虽然不主张退鲁进唐，但与张岱不同，他视隆武政权为兄弟之邦而非仇国。鲁王入海之后，他回到东阳。六月二十五日，闻义乌陷落，遂投池死，年仅五十二。张岱言其最得人心：“张国维长厚忠贞，其乡人与天下人称之为如出一口。”

鲁王及残部入海之后，虽然多经波折，但最后为郑成功所收容。鲁王这时实已退出历史舞台，但大臣张煌言等与郑成功合作无间，最盛时曾率师逼到南京城下。张岱在《石匮书》的《鲁王传》中说朱以海“见后人，则前弃若弁毛，闻后言，则前言视为冰炭”，多有嫌鲁王不听从自己建言的怨艾情绪，未必中肯。但他对南明五王的总评中却有几句话很适用于鲁王：“得居民拥戴，有一成之旅，便得意志满，不知其身为旦夕之人，亦只图身享旦夕之乐。”又言：“黄道周、瞿式耜欲效文山之连立二王，谁知赵氏一块肉，入手即腐糜烂！”如此庸碌，欲与图成，真万万不可得之数也。

“只图身享旦夕之乐”的只有福王和鲁王，不应该把唐王、桂王混在其中。但“赵氏一块肉，入手即腐糜烂”这话却说得极好。张岱为鲁王讳，仅说唐、桂二王，其实鲁王又何不然？

第二日晚上，恰好道署幕府的某位先生来访，我试着问起那土台的事。他神情严肃地说：“那下面有口井，是明朝忠臣昆山人曹公廷楨的死难之处。甲申年，曹公正要被选调入京，路过此地，到公署拜访朋友。忽然有差役报告煤山（崇禎自缢处）之变，曹公捶胸大哭，说：‘我不忍心侍奉二主！’于是纵身投井而死。当地人人敬佩他的忠义，就封闭了井栏，上面加了黄土。因为靠近官衙，不敢修建坟墓和墓道，可它不忍心再用这口井的水，就把它筑成了平地般的土台。”

如今，现在科学的角度来看，当年“砸金鸡”发出的响声，应该是瓮城的声音共振现象，蕴含着复杂的声学原理，本质是回声所致，并无神秘之处。但在那个社会愚昧落后的年代，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都被归因于鬼神，进而演变成一个美好的故事。人们总爱为家乡赋予各种美好的传说，兖州人也不例外，这则传说还被当时的竹枝词所传颂：

多少游人寻古迹，强半皆欲打金鸡。城垣均被拆穿洞，不是游览是财迷。其地如何有金鸡，物理说明不足奇。撞击地下回音处，误作鸡声启人疑。

对于当时的孩子们而言，到北城门“砸金鸡”是极具趣味的活动，因此这一习俗传了一辈又一辈，成为许多老兖州人难以忘怀的童年趣事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随着城市发展规划，护卫兖州老城的古城门与城墙被陆续拆除。北门“砸金鸡”的传说，最终只能留存于兖州人的记忆之中。

《夜雨秋灯录》是清代文学家宣鼎创作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，成书于光绪年间，与《聊斋志异》风格相近，以志怪故事为主，兼具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。宣鼎曾在兖州做过幕僚，熟知当地人文，其中就有篇《忠魂入梦》的故事，便发生在兖州——

兖州道署在兖州府城西面，原本是明末都阉府的旧址。观察使某公到任后，喜欢署衙西边的一块空地，觉得可以用来修建园林，种植花草，于是挖池塘、引泉水，运石头、堆假山，还建了一座如伞盖一样的凉亭。他常在这里吟诗长啸、饮酒赋诗、赏玩器物，以收藏鼎彝等古物为乐。

我在滋阳做幕僚时，某公子（任司马一职）设酒邀请我，我便同他一起登上假山。看到西墙外有一块方形土块，长约两丈多，高约五尺多，又宽又广且平整，我怀疑那是个土台。心想如果顺着地势堆成嶙峋的假山，周围再建回廊屋舍，那么园林的走势曲折有致，石板小径蜿蜒曲折，岂不是又添胜景？我心里这么盘算着，却没说出来。喝醉后，提着灯笼回去，昏昏沉沉地就枕而睡。

睡梦中，恍惚惚见一位身穿红袍、头戴纱帽的贵人，面色白皙，胡须浓密，长眉高额头，在庭院中来回踱步。不久，一个小童递上名帖，口中说鲁公前来拜见。我正要细看名帖上的名字，贵人已经走进来，昂首拱手，坦然坐下，瞪着眼睛看了我许久，说：“你白天见到的那处土台，知道下面是我的葬身之地吗？这是我魂魄栖居的地方，不能当作游览场所。当年我仓促赴身，既没有碑志，也没有祠堂庙宇；年长有德的人渐渐离世，史书上也未有记载，实在是寂寞啊。你既然在写《夜雨秋灯录》，为什么不记下大概情况，让后来在这里做官或游历的人，知道这里有我这么个人，不至于湮没在这里，这不也是一段笔墨缘分吗？”我心里虽然答应了，还想再问问详情，却嘴巴发僵说不出一个字。贵人随即起身，我只能下拜相送。贵人说：“明天，我会派人把名字告诉你，你可以大致了解一下情况。”说完，一边走一边低声吟诵起来：

“寒泉有百尺深，却能吐出如虹般的气势，多少风云变幻都藏在这口井中。即便遗体被黄土掩盖，忠魂也已追随先帝而去。

回想当年在燕台策马前行，途中顺路拜访绿杨莺。突然听闻先帝自缢的噩耗，国破家亡之际，我怎敢苟活于世！”

随行的妾姿玉叫官娘，也一同殉节，留下美名。行人不要把这口井当成陈后主的胭脂井，当年王虔（井上辘轳）曾窥见井水，至今仿佛还带着香气。

这高起的土台千古留存，就像金蚕从茧中飞出令人哀叹。每年清明节风雨交加，又有谁会带着梨花和麦饭来祭奠呢？

忠义的光芒能照亮深渊，我曾在岱云边闲游。何必用短碑题写名字，就像杜甫在南楼已成散仙，精神永存。”

吟诵完，他回头看我，挥手像是示意我止步。我正惶恐疑惑，仿佛脚下误踩了青苔，一滑摔倒，就此惊醒。枕上默默回忆他所吟诵的诗，一字不差。听着窗外风声唳唳，好像吟诗的韵律还在耳边。我把这些记在心里，觉得这事实难测。

第二天晚上，恰好道署幕府的某位先生来访，我试着问起那土台的事。他神情严肃地说：“那下面有口井，是明朝忠臣昆山人曹公廷楨的死难之处。甲申年，曹公正要被选调入京，路过此地，到公署拜访朋友。忽然有差役报告煤山（崇禎自缢处）之变，曹公捶胸大哭，说：‘我不忍心侍奉二主！’于是纵身投井而死。当地人人敬佩他的忠义，就封闭了井栏，上面加了黄土。因为靠近官衙，不敢修建坟墓和墓道，可它不忍心再用这口井的水，就把它筑成了平地般的土台。”



夜雨秋灯录

风语者

到了道光某一年，有位在此地做官的某公，他的妾室向来骄横，也是个河东狮。夏天怕热，见这土台在绿荫下，四面凉风习习，就瞥着花、敷着粉，穿着短罗衫，坐在土台上纳凉；还跷着小脚，吸水烟，婢女们围着伺候，欢声笑语不断。

忽然她大叫着倒地，像中了疯病，脸色青紫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口吐白沫，用昆山口音骂道：“什么淫荡女人，敢如此无礼！这里虽然干爽，但下面是我的墓穴。你一个妇人，坐在我的屋顶上，还有比这更亵渎的吗？而且打扮艳丽地吸烟，成何体统！你丈夫也是读书人，怎么一点家教都没有，想来是怕你的悍妇威风吧？我实在不能饶恕你这妖妇！”说完，自己打自己耳光，粉和胭脂都糊了，美丽的容貌被揉得乱七八糟。婢女们狂呼，仆妇们都赶来，却拦不住。赶紧请某公来，他听了妾室的话，知道是冒犯了神灵，急忙下拜认错，请求宽恕。接着听到冷笑道：“我家也有妇人，要是她又着腿坐在你家屋顶的鸱尾（屋脊装饰）上，你心里能安吗？”某公说：“确实是这婢女无礼，我一定严厉教训她。但您既然葬在这里，求告知姓名。”只听大声说：“我是明末的曹廷楨。”再问时，妾室已经苏醒，扶到上房，用药后才好转。但从此她吓破了胆，骄横的气焰收敛了不少，不像从前那样放肆了。

如今观察使某公，随即向郡县的父老询问曹公的事，大家都说确实有这个人，这件事。但至于他具体是什么官职，一同死的有谁，死在哪个月哪天，昆山有没有后代，就说不清楚了。观察使发函询问昆山的县令，也没有回音，府志里也没有记载。

这位先生说到这里，见蜡烛快燃尽了，就告辞了，第二天一早便回省城。

我突然想起昨晚梦中的忠臣曹公，难道就是那位穿红袍戴纱帽、背着手长吟的人吗？玩味他的诗句，或许还有叫朝云的人一同赴死，而兖州人不知道？赶紧叫人拿笔墨，恭敬地抄录下来给众人看。大家都说这是附会，不太相信。唉！夕阳树荫之下，心里有所想，灵魂就进入我的梦中，曹公的神灵何等灵验啊！我命中注定漂泊不定，倘若到了昆山，一定要亲自寻访曹家后人，或许能知道详情。姑且记在这里，也算不辜负忠魂托付的厚意。

拱极门“砸金鸡”传说

佚名

古兖州北城门——拱极门附近，自古便流传着“金鸡”的传说。据康熙十一年《滋阳县志》卷一《古迹》记载：“城外东北隅有石，击之如鸡鸣声。”

最初的兖州古城为土城，隋唐时期，四门城楼改为青砖材质。大明王朝立国后，推行藩王分封制度，朱元璋第十子朱檀被封于兖州，成为首任鲁王。兖州升级为兖州府，共辖四州二十三县。

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朱檀的舅父、武定侯郭英奉旨修建鲁王府，并重新扩建兖州旧城；城墙南移，改为坚固的砖砌结构，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随之建成，此时城门已有初步命名。四座城门曰：东城门九仙门、南城门德政门、西城门泗水门、北城门青石门。

天顺年间，知州伍礼等人主持修建四座城门的城楼，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工程竣工，还为城门配备了铁券与砖石匾额。此后的正德、嘉靖、万历等年间，兖州城门因年久倾颓或边警需求，多次修缮、增筑，名称也在这一系列工程中逐步更改，如东门从九仙门改为宗鲁门，

南门从德政门先后改为延熏门、瞻峰门等。而北门则后来改为拱极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北门并未位于兖州城区的南北中轴线上，而是为避开鲁王府，选址向东偏移了一百多米。鲁王府作为核心建筑，被规划在原兖州城北部的中央的南北中轴线上。这一布局使得兖州城北门外东门东移后，瓮城结构改为“扭头门”——外门向东开启，与主城门形成垂直防御夹角，可有效延缓敌军进攻，方便守军侧面夹击。同时，北门附近城墙加高、垛口加密，还配置铁炮等防御设施，进一步强化了城北的军事屏障作用。

北门瓮城内，常年驻守着负责开关城门的管理人员。传说某日深夜，一位守城门的老头被一阵嘈杂声惊醒，披衣出门查看，借着月光，他隐约见瓮城内有东西来回跑动，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定睛细看，竟是一群大小不一的鸡在月光下觅食，每只鸡通体发亮，散发着淡淡金光，正悠闲地在地上刨食。

老头看了许久恍然大悟：这可是稀

世珍宝！若能抓几只，便能发大财，后半辈子可享荣华富贵了。他当即推开门，急忙向鸡群扑去。鸡群见突然有人闯入，顿时乱作一团，咕咕叫着纷纷钻进城墙之中。老头追到城墙边，金鸡早已不见踪影，他对着冰冷的城墙，捡起一块砖头砸去，只听到墙内传来“咕咕咕”的鸡叫声，却不见金鸡现身。

从此，北门瓮城里有金鸡出现的传说，便在兖州城内不胫而走。当地老人说，后来一位“南蛮子”得知了金鸡的消息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用金谷子、金稻米设下诱饵，引诱金鸡群现身，成功逮住一只来不及逃脱的金鸡，随后携带宝物逃之夭夭。自那以后，北门瓮城里的金鸡，便再也不敢出来了。

据一些年长的老兖州人回忆：“爷爷常带我们小孩子到北门外瓮城向东的扭头门城角处‘砸金鸡’。顺手捡一块石头，往烂砖堆的特定地点狠狠一砸，立刻会发出‘唧’的一声鸡叫，绝不是砖块相互撞击的声音。爷爷说，城墙里的金鸡还在，那是咱们兖州的宝贝。”